

符号、景观与文化空间

于风军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

符号、景观与文化空间

于风军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景观与文化空间 /于风军著.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24-09693-4

I.①符… II.①于… III.①历史地图-研究 IV.

①K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418 号

符号、景观与文化空间

作 者: 于风军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23.2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9693-4

定 价: 45.00 元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 编：耿占军

副 主 编：潘明娟 陈正奇

编委会委员：(姓氏笔画为序)

于风军	王社教	王 晖	方光华	吕卓民
朱士光	刘 宁	李令福	李健超	张新科
侯甬坚	贾二强	贾俊侠	徐卫民	黄留珠

《长安历史文化丛书》总序

朱士光

—

当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蓬勃开展,并开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华大地上也兴起了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热潮,以增强国家之软实力。其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板块之区域性文化研究,也显现出强劲势头。在这一形势下,处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与核心地位之长安文化,显然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也更受各界之关注。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需求,西安文理学院以富于前瞻性的眼光,适时地于2008年初建立了以副院长耿占军教授为负责人的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并于当年10月,经专家评议通过被陕西省教育厅批准确立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之为平台,汇聚院内学术精英,并广泛联络院外知名学者,合力推进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事业持续而深入地发展。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建立后,在充分征求采纳院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规划,确定长安历史地理、长安文献、长安历史与文化作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之主要研究方向。计划除定时编辑出版《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以便及时汇编推出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之论文、述评与相关讯息,促进学术交流外;还决定出版“长安历史文化丛书”,陆续分批次出版有关长安历史文化之富有新知卓见的研究性专著,以推进长安历史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这样,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通过组织研究并出版“长安历史文化丛书”、《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集以及“长安文献资料汇编”,三者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必将推动长安历史文化之全方位深入发展,使长安历史文化研究,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超迈前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还达到带动西安文理学院学科建设与教学水平发展,

有助于西安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发展之经世致用的预定目的。

二

前已述及,长安文化相对于组成中华文化的其他一些地域文化,处于源头与核心地位,这是历史铸就的史实,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以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文化发展也最具影响力的西周、秦(含秦国与秦王朝)、西汉、隋唐等王朝都城所在的今陕西省中部关中渭河下游平原地区(简称关中地区,也称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关中盆地由于位居我国腹心地带,是我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区;又处在我国国土之第二级阶梯东部,因而面对其东部第三级阶梯上之广大平原、丘陵地区,就处于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在地理区位上拥有先声夺人的优胜地位。加之关中盆地东临黄河,南靠秦岭,西阻陇山,北倚北山山系,四周又有函谷关(东汉末改在潼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金锁关、临晋关等多处雄关险隘拱卫;关内渭河下游之冲积平原与黄土台原,气候温润,地形平衍,河流纵横,草木繁茂,土壤肥沃,物产富饶,自然环境也十分优越。对此,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政治家与地缘政治学者早有论断。如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初即位,苏秦西至秦国都城咸阳说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②后历117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终于凭借这一地理区位上的优势以及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功,“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③次第灭亡了东方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①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由西而东逐级下降,因而在地貌上也形成了由三个阶梯构成之格局。即第一级阶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中部高原与盆地,由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组成,海拔大都在1000—2000米间;第三级阶梯东部平原与丘陵山地区,平原海拔大多在200米以下,除长白山、武夷山、台湾山脉海拔高度超过2000米,台湾玉山山脉主峰玉峰海拔达到3850米外,其余山峰大多在1500米以下。

②《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③西汉·贾谊:《过秦论》。

个统一的大帝国。也就是实现了当初苏秦之“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①的预言。公元前202年,西汉高祖刘邦在击败强敌项羽,天下初定,欲都雒阳之际,齐人娄敬适时进见,说之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②而刘邦在进一步听取了他信赖有加之谋臣留侯张良所言:“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③刘敬说是也”后,作为一代明君,刘邦毅然力排左右原籍殽山以东大臣欲高祖都于雒阳之偏见,当日就起驾,入都关中。^④由此而为巩固西汉一朝214年帝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唐朝初年,也是由于秦王李世民力排众议,劝阻了唐高祖李渊迫于北方强敌突厥一时之咄咄攻势,欲迁都樊、邓间,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⑤坚持建都长安,终于成就了盛唐王朝。

关中地区,正因为具有上述地理区位、地理条件上的特点与优势,曾被唐代大诗人杜甫咏为“秦中自古帝王州”。^⑥后又于明清之际被力践“经世实用”治学思想之地理学家顾祖禹论为是“关中形胜,自古建都极选”。^⑦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形成的历史文化自必内涵丰富,积淀深厚,体大品高,影响深远。

论及长安文化的核心内容,当由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构成。这当

①《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②《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③《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

④《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⑤《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

⑥杜甫:《秋兴八首》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中华书局,1960年。

⑦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五三《陕西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然既因西周、秦、西汉、唐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其文治武功均对我国之历史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还因为这四大王朝均建都关中,特别是四个王朝主要都城周丰镐、秦咸阳与汉、唐长安城,还集中分布于关中地区中部之西安小平原上。遗迹宛然,触目皆是。

就西周、秦、西汉、唐四大王朝之文化内涵而言,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历史上,以至迄今均发挥了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教化育人培植各方英才、创新知识提升人类智慧、资政惠民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周、秦、汉、唐四大王朝文化之精髓,可作如下之概括:

周文化之精髓为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并借助分封诸侯,将周王朝“敬天保民”、“重农裕民”^①之治国理念推行到各诸侯国。

秦文化之精髓为制度文化。秦王政于统一全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废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又实施“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等政令,以强化皇帝独裁威权,巩固其统治。秦始皇创建的许多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制度多为后世所继承,当然也有相当的变革。

西汉文化之精髓是汉武帝时获得独尊地位之儒学。尽管当时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黜,但在实际施政时,仍是“霸王道杂之”^②,即儒学与黄老刑名之学并行施用,相得益彰;并通过经董仲舒加工之儒学,调和相关学说,使之既符合西汉实施大一统政治之需要,也促使西汉统治者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仁德之治。从而使儒学得到更大的发展。

唐文化之精髓则是儒道佛兼容并包,对域外伊斯兰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海纳包容。因而造就了唐文化之灿烂辉煌,并成为世界文化之高峰。

唐之后,长安文化虽已不似周、秦、汉、唐文化那样气势磅礴,刚劲雄健,但在继承中也有发展。

①《尚书·无逸》、《尚书·泰誓》。

②《汉书》卷九《元帝纪》。

长安文化,正因为其核心成分是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因而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自然处于主流地位,而在我国各地域文化中也成为源头与核心。因为我国许多地域文化,虽然其历史渊源都如长安文化一样,远超西周之前;然而在其地域文化具体形成历程之关键阶段,大多从西周之礼乐文化中接受了至关重要的内容与影响。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河洛文化、荆楚文化等。西周初年,分封的齐太公吕尚、鲁周公姬旦、吴太伯、燕召公姬奭、晋唐叔虞、楚子熊绎均为周王室血缘勋亲或股肱重臣;及至战国时立国之赵、魏、韩氏之先祖,也曾受周王室封赏。迨至秦、西汉、唐王朝时,这些王朝的强势文化也都从关中之咸阳、长安传播到各个地域,各地域文化也都受到重大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长安文化应从中华文化源头与核心这一层级面上来认真看待,全面深入进行研究;以使人们对长安文化获得深刻的认识,从而也推进我国各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

西安地区究因是周、秦、汉、唐等重要王朝与另一些政权建都之地,所以至迟自西周以来就有史官与学者文人记载这一地区之史实,如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等等,之后历代多有,积淀深厚,类型既多,数量甚钜。正因为这样,所以唐之后,历宋、金、元、明、清,各代也均有学者对故都长安或进行探访调查,或进行文献注释,或进行研究撰著。他们留下的丰硕成果,既是他们研究长安历史文化之心血结晶,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长安历史文化提供了更多的资讯。迄止民国与共和国时期,更有一批中外学者应用新的学术观点与新的研究方法对长安历史文化所涉及的问题,或撰文,或著书,或进行专题考证与研究,或进行综合性的论述,或进行理论性阐述,种类繁多,为数颇丰。

迄止当前,尽管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且出现了集体性的成套的研究与撰著成果,例如 2006 年三秦出版社由魏全瑞主编,整理出版的有关古长安的史地文化典籍 10 本,名为“长安史迹丛刊”;又

如,自2002年以来,西安出版社连续出版了由崔林涛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史念海、朱士光等任副主任,组织西安地区专家学者编著撰写的“古都西安丛书”28本等。然而,从已出版发行的“长安史迹丛刊”或“古都西安丛书”之书目看,整理有关古籍丛刊之选目不够全面,而研究性丛书之选题也有缺漏;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升华性的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理论阐述的专著,除黄新亚于1989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文化史概论》上卷之《长安文化》一书,差强可列入外,尚未见有新著问世。上述情况说明当前有关长安历史文化研究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继续不断努力,予以完成。

前文虽已述及,长安历史文化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以今西安市所在之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其研究内容,即为这一地域范围内上起距今100万年前,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蓝田猿人时代,下迄当今之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且应以周、秦、汉、唐文化之精髓为重心;很显然这都只是总括性之表述。然而从中也可看出其包涵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多样的。即从西周礼乐文化、秦之制度文化、西汉独尊之儒家文化、唐代儒道佛诸家学说竞相发展之包容性文化这一长安文化主流脉络看,其内涵就十分广博深邃。再就周、秦、汉、唐都城文化论,也包括有宫室建筑、祭祀礼制、宗教活动、学术艺术、教育伦理、科技工艺、服饰饮食、歌舞竞技等多个方面。如再加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变迁之考察论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发掘研究、民俗民风与民间文化之调研整理以及有关长安历史文化之学理上的探讨建设等,其内容就更为庞大丰厚。因而,当今我们面对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宏大事业,必须怀抱宏大的胸襟,秉持广阔的视角,洞悉历史的进程,把握时代的走向,通过长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不断加以推进。深信凭借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进行擘画筹策与组织协调,依仗有志于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各有关学科学者的严谨研治与悉心撰写,不断奉献出精品力作,“长安历史文化丛书”的相继出版,必将对西安市以及关中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对长安历史文化研究

以至中华文化复兴之伟业,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2009年8月5日

绪论

一、本文研究的主题与任务

方志舆图是我国独具特色、数量众多的传统文献——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舆图与方志的文字记载为表里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地图的一个类型,方志舆图在记录与传递某一地域的地理信息时,具有直观性的效果,也附加了绘制者的意识与观念。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化积淀极为厚重。13个王朝建都于此,地志的修纂独领风骚,名志迭出。对方志舆图的解读与利用研究,陕西方志舆图当为首选。本文旨在利用陕西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充分挖掘历史地理学的文献资源,为历史地理学探索新的研究途径。

历史地理学研究是着眼于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这一基本研究对象的,方志及其舆图对于历史地理学来说,一般情况下是其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能够为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复原提供必要信息的众多文献的一种;若专门以方志舆图为对象进行研究,应该属历史地理文献学的范围,可是在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作为历史地理信息载体的方志舆图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方志舆图的符号所表示的内容在多数人的眼中都是示意性的。那么,方志舆图的符号所表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子?对历史地理学研究有没有价值?又能有多大的价值?怎样发挥方志舆图的价值?如何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

方志舆图是由多种多样的符号组成的,是通过符号来记录与再现历史地理信息的特殊的文献形式。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就是要通过对方志舆图符号的解读,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历史地理复原,进而复原历史地理空间的发展过程,探索历史地理发展的规律。

对方志舆图符号的解读,需要对方志舆图的符号所表示的内容进行

研究,这必然会涉及到对方志舆图制作的研究。对于方志舆图本身而言,方志舆图的绘制与方志舆图的内容,或者说方志舆图说些什么与方志舆图怎么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不可或缺。然而,方志舆图的制作包含着方方面面的要素,而与方志舆图内容密切相关的是方志舆图的概括,包括分类、简化、夸张等,在研究实践中,首先关注方志舆图制作上这些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具体研究中自始至终都要考虑这一问题。

对方志舆图内容、制作与价值的研究应与方志舆图的利用相结合,而对于方志舆图的应用实践应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方志舆图内容之所以没有被作为专门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最突出的表现是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具有明确应用指向的、作为理论构架的基本概念与概念体系去表述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示的地理事象及其相关的事象。

从方志舆图所表现的内容看,绝大多数是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的可以见到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而从方志舆图对地理现象的表现方式看,无论是采用形象符号还是采用几何符号,都主要是表示绘图者在一定地域的某一方向的上空以某种角度俯视地表时所看到的景象。方志舆图所表现出的这种视觉上的特点与地理学中景观概念的特点所体现出的认识方式基本一致,因此在方志舆图研究中引入景观概念进行景观历史地理研究是较为合适的;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以历史景观这一概念为核心,建立一个旨在便于方志舆图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应用的理论体系,无论对方志舆图的研究,还是对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是要在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理论的构建。

二、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方志舆图的研究与利用

近来人们对方志舆图有所关注,以此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较早从总体上对方志舆图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

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第4期),对运用现代地图学的基本原理对方志舆图的方位、比例尺、图式符号、绘制准则作了初步分析,认为“经营位置”为古代志书地图绘制之准则;〔美〕范德(Edward L. Farmer),对天一阁明代方志中的舆图进行了初步的解读,(《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在本项研究的进行过程中,又有一些关于方志舆图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主要有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天津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3期),分析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出现的状况、方志中地图绘制特点及其与普通地图的比较、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文献价值;潘晟《试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依据对现存天一阁藏明代方志的阅读,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纂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旧志图、地方舆图、历史地图集等地图资料编纂方志地图;二是依据野外踏勘或口述绘制新图;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在考察现存天一阁明代方志的基础上,对明代方志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这一时期方志地图的绘制者大致可以分为儒士、普通绘画工匠和专业刻书工匠。这些研究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古代方志舆图的情况提供了较好的分析,但这些对于方志舆图的研究都是围绕着方志舆图的具体内容以外的东西来进行的,与本文将如何解读方志舆图的内容并通过对方志舆图内容的解读进行历史景观的复原与历史人文空间结构的分析作为研究的主旨相去甚远。

在历史地理学或环境变迁的研究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利用了方志舆图的,如吴宏岐、史红帅《关于清代西安城内满城和南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利用康熙《陕西通志》卷首《会城图》、雍正《陕西通志》卷六《疆域》所附《会城图》、嘉庆《咸宁县志》卷一《疆域山川经纬道里城郭坊社图》所附《城图》、《县治东路图》、光绪十九年十月中浣舆图馆测绘的《西安府图》、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一

《城关图》、康熙《咸宁县志》和康熙《长安县志》的《会城图》等方志舆图和相关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探讨了清代西安城内满城的城墙走向、城墙质量及城门设置等诸多细致的问题;桑广书、甘枝茂、岳大鹏的《元代以来洛川塬区沟谷发育速度和土壤侵蚀强度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利用现存洛川县最早的县志——成书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的《洛川县志》,据其中的插图确定了1660年时南沟沟头的位置,以此为基础对南沟的沟头前进速度进行测量,为元代以来洛川塬区沟谷发育速度和土壤侵蚀强度提供了基础数据。但这些研究都不是以方志舆图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与本文将如何解读方志舆图的内容并通过对方志舆图内容的解读进行历史景观的复原与历史人文空间结构的分析作为研究的主旨也不相同。

(二)景观历史地理理论研究

目前为止,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空白。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景观概念的应用的探讨则有人已在着手进行。

景观是一个应用极为广泛的词,以它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涉及地理学、建筑学等诸多学科,而每一个学科领域中景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不同。既便是在地理学领域内,一百多年以来,景观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的学者、不同学科分支、不同的文章乃至不同的场合,其差异和变化着实让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个易于误解的词。所以,以景观为核心概念建立起适合方志舆图研究的理论体系,首要的任务是将景观概念阐释清楚、明确。

事实上,至今为止,历史地理学界对于景观的研究仍然处于初始阶段。曾有人试图对景观在历史地理学应用作了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如晏昌贵、梅莉《“景观”与历史地理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讨论了“景观”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问题,并提出了历史景观地理学或历史景观学的学科概念,其目的在于以“景观”来解决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二元分立的现象。在

当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无论是利用传统的文字性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景观的研究,还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历史景观的研究,都与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示的内容相对应的景观概念相去较远,对以景观为基础建立适于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理论,缺乏可以借鉴的意义,因此,要将景观作为适于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的基本概念,需要对这一概念重新定义;并围绕着景观这一概念建立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即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任务、内容与方法。

三、本文研究的路线

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是探索性研究,在研究中是以研究的实践为基础,不断地进行理论总结,再指导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实践,是本文研究的基本路线。

方志舆图的数量是众多的,要对方志舆图的内容、制作与价值的问题作以解答,是要将这个问题落实到某一幅图的内容、制作与价值上;将历史地理学研究落实到方志舆图符号所表示出的历史景观个体上,将宏观问题落实到微观问题,将共性问题落实到个案研究。本文的研究就是将个案研究作为整个研究的基础。

本文对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的研究是以明至民国时期(1368—1949)陕西方志舆图为例的。陕西方志是我国方志的一个地域类别,其中所包含的舆图的总数超过了2000幅,其种类多样,所涉及的历史景观也比较复杂。之所以以陕西方志舆图为例,是因为明至民国时期陕西方志舆图无论在制作水平上,数量上,还是在其所涉及的内容上,在同时期的中国方志舆图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方志舆图一样,陕西方志舆图特别是明至民国时期的方志舆图也没有作为对象性实体而被认真研究过,对于陕西方志舆图的绘制与舆图的内容的研究更是空白。通过利用明至民国时期陕西方志舆图来进行历史地理研究,是能够探索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一般规律的。本文在对

陕西方志舆图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对一批有特色的舆图的内容与制作进行重点研究,形成了景观历史地理研究实践的个案,其中主要的成果被放置在作为论文主体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实践的论述中。

理论总结是本书的重要主题,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反思与总结,围绕着历史景观这一基本概念,通过逻辑推演,结合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完成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

四、研究的重点与内容安排

利用方志舆图进行历史地理研究,无论从实践上说,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因为这样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分割的。

本书第一章探讨了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诸如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即历史景观,研究的任务与内容,研究的方法及陕西方志舆图及符号的一般特征等,这些都是在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并用于指导具体研究实践的。

第二章至第八章通过案例研究对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基本问题三个方面的七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以对方志舆图中的漠、八旗马厂和沙苑的研究为例,对基于方志舆图的景观历史地理研究中以方志舆图符号特殊性的分析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使用特点与要求进行了讨论;第三章以对方志舆图中杨填堰与山阳县地域与城市景观的研究为例,探讨景观差异方法的使用;第四章以对乾隆《怀远县志》与康熙《潼关卫志》的舆图所表现出聚落与城市景观的研究为例探讨了逻辑实证分析方法的应用。第五章以对方志舆图中山河堰、龙洞渠与洽水诸渠的研究为例,探讨方志舆图中历史景观的客观性与复原研究问题;第六章以对方志舆图中的五门堰、廉水诸堰与西乡五渠的研究为例,对方志舆图中的历史景观的主观性及历史人文空间的构建进行分析。第七章以对方志舆图中韩城森林景观与石川水渠的变迁的研究为例,对历史